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CHUANCHENG YU BIANGE

Chuancheng Yu Biange

传承与变革

—— 从君主民本到民主宪政

朱仁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CHUANCHENG YU BIANGE

Chuancheng Yu Biange

传承与变革

—— 从君主民本到民主宪政

朱仁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与变革：从君主民本到民主宪政 / 朱仁显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6

ISBN 978 - 7 - 5161 - 0791 - 1

I. ①传… II. ①朱…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31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45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文库受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985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及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建设项目的资助。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编 委 会

(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组成)

主 编 陈振明

编 委 朱仁显 李明欢 陈炳辉 卓 越

胡 荣 黄新华

总 序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领域，而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急需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创新研究。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施政府管理创新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依法行政的水平。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关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因此，加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以及公共服务的创新研究，对于推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向前发展，增强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应用，更好地服务于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治理与政策创新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我校就设立了相关的系科，中间几经调整分合及停办。80 年代中后期，作为国内首批恢复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我校复办政治系，不久更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系”，2003 年成立公共事务学院。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以及原来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始终把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作为学院的发展重心。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设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点（另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二级博士点），行政管理同

家级特色专业，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政治学理论 3 个省级重点学科，福建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公共政策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福建省“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福建省公共政策教学团队，厦门大学“211 工程”三期“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及“985 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厦门大学“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研究”创新团队等。

我校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与教学走在全国前列，已经形成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专业结构比较合理、创新能力较强的人才团队。其中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教师奖”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及特等奖提名奖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省高校名师、福建省“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和“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等优秀人才；并形成了包括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政策分析、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服务及其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社会管理及社会保障、国家学说、新政治经济学、社会性别与公共事务等在内的多个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或方向。

作为厦门大学“211 工程”三期“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及“985 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围绕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这一核心，遴选我院教师“211 工程”及“985 工程”课题研究成果以及优秀博士论文汇集出版，旨在显示近年来我院公共管理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加强与国内外学界的交流，推进我国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创新与知识应用。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陈振明

于 2011 年 4 月 6 日

（厦门大学九十华诞纪念日）

目 录

第一编 源远流长的君主民本思想	(1)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3)
孔子的治国理念及其历史影响	(20)
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轨迹与影响	(31)
张居正改革思想的精要	(48)
传统中国吏治的经验与省思	(59)
黄宗羲的政治批判与政治期待	(69)
第二编 欧风美雨击打下的民主构想	(75)
张之洞的文化困扰与思想流变	(77)
晚清中西法观念的异趣与冲突	(91)
承先启后的维新派君主立宪思想	(107)
立宪派的议会政治观	(128)
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擘画	(144)
追求民主与富强的两种模式	(154)
章太炎与孙中山建国与治国理念的歧异	(164)
中国近代民主梦碎的迷思	(175)
第三编 中西文化视野中的宪政梦寻	(185)
中西文化与张君勱、胡适的宪政思想	(187)
个人自由、政府权力和社会公道的平衡	(205)

2 目 录

人权保障与民主宪政	(219)
宪法、法治与民主宪政	(238)
“修正的民主政治”与胡适的“好政府主义”	(255)
政党政治的功能与多党政治的期盼	(284)
思想启蒙与制度构建:不可替代的价值	(307)
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17)

第一编

源远流长的君主民本思想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血脉绵长，政治思想独具特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支配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传统政治思想，使之具有深深的历史烙印、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各家各派代表人物和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对自然和人文社会的挑战，进行了大量的理性思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或相互激荡冲突，或彼此交融互补，成为中华文化中一道美丽的风景，也深深地影响了政治社会的进程。追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我们可以窥见其丰富的内蕴和复杂的成分，其中既有为君王和统治阶层服务、愚民使民、玩弄权术等落后的理论和思想，也不乏富国富民的政治目标、理法相济的政治原则、选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德礼刑政并用治国理念等富有价值的政治认知和思想，对此学界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本编无意赘述，只是选取君主主义和民本主义，以及二者的交融影响加以分析，在宏观论述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特点、儒法政治思想融合互补、传统吏治经验等问题的基础上，主要选取孔子、张居正、黄宗羲的思想加以分析，深入观察中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君主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政治文化是指内化在政治体系内成员的一套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体现着公民对政治的价值取向。它在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借助政治社会化这一社会遗传机制而形成，是一定政治结构的基础，能够持久地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态度、政治结构模式、政治的稳定和变迁。我国历史悠久，从先秦到晚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走过了四千多年漫长的历程，经历了形成、发展、衰微、转型的历史过程。由于时空流转，朝代更迭、个人认知差异，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都不尽相同，甚至有诸多分歧变化。但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变革中有传承，歧异中有共性。概而言之，不外乎人治主义、王权思想、民本思想、礼治主义、清官期盼。这些特点鲜明地体现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透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深化对传统文化和专制政治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今天对传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

一 根深蒂固的人治主义

现代政治的重要特点是崇尚法治，这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清醒体认，以为这一弱点无法完全靠内心的自觉来克服，而必须靠外在的约束，即根据国民公意制定国家宪法及其他法规来规范全体公民、社会组织、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由此形成的政治集体潜意识是重外部调节。

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与之恰恰相反。它相信人心之善，即便其中有恶素，也可以通过修身解决，“人皆可以为尧舜”；相信人心有无限的潜能可以发掘，认为依靠内心的修养可以造就理想的道德人格，进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理想的社会。于政治遂持人治主义，即强调统治者的政治作用、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贬低甚而忽视法的功用。

这一政治文化精神至少可以溯至先秦儒家。孔子曾竭力强调“为政在人”，以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①，“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荀子则以“有治人无治法”寥寥数字精辟地概括了古代的人治现象和人治思想。这一思想后代相沿相生，沁入中国人的心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认知。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政治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久长，必须培养贤人，而这一切必须从培养道德情操着手。此所谓“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④这也就是宋儒极力弘扬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达到上行下效、内圣外王的境界。由于强调内省、教化，致力于造就完美的人格，政治的全部学问遂化为无力的道德呐喊和说教，谆谆而言的无非忠孝和社会责任，无非是顺从原则，希望培养道德完人，进而实现仁政。由于政治没有常轨，缺乏恒久的准则，因此每每因人而异。尽管历代统治者都渴望实现仁政，但历史往往不如人意，往往走错房间，物质利益和人性弱点，使塑造完美人格的企图归于虚幻，仁政每每让位于暴政。

由于政治社会化的极端有效，就使得人治主义成了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中国人莫不以为政治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为政之人的好坏。所以，论政者总希望出现圣君、贤相、清官和淳朴的人民，很少从制度上想办法。政治坏了，国家弱

① 《礼记·中庸》。

② 《论语·颜渊》。

③ 《中庸·二十年》。

④ 《论语·宪问》。

了，社会乱了，一概归咎于当政君相的无德无能，执政官吏的贪赃枉法，民风的巧诈，而不怪罪于导致这一切的制度，以为“徒法不能以自行”；认为就算有了好制度，没有好人，仍是枉然，同样的制度，有好人便有好的政治，没有好人便没有好的政治。所以，历代官民深为忧虑的是人心道德问题。“窃曾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①“自强全在得人，法制未可轻变。有治法，无治人，虽得泰西之法而效，亦徒使其利营私之计耳。”^②近人曾国藩和李秉衡的话语正是传统中国人治思想的生动写照。

人治主义外化为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治现实，导致君王大权独揽，滥施法律，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成了权力的婢女，缺乏应有的权威和尊严。政治带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个人狭隘性。也正因此，传统中国政治虽乱多治少，屡遭暴虐、腐败、动乱、衰亡之苦，依然无法获得新生，永远在治乱相循的怪圈中轮转，而无法走上民主和法治的轨道。

二 深入人心的王权思想

与人治主义相联系的是王权思想。在政治系统的万千角色中，传统政治文化独倾心于君主，王权思想根深蒂固。千百年来，陋儒及帮闲文人绞尽脑汁进行无休止的神化君权的造神运动。先秦韩非发其端，汉朝董仲舒、唐朝韩愈继其后，宋明理学家竟其绪，可谓不遗余力。在政治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主张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依君命施政。一般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① 曾国藩：《复彭丽生书》，载王文濡选辑：《续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49页。

^② 李秉衡：《奏陈管见折》，载《李忠节公奏议》卷十，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750页。

都用这一原则分析政治问题。遵循这一原则设计政治制度，制定治国方案，提出改革主张。王权思想的基本内容有：

首先，把君主抬到超人地位，视君王是上帝在世的化身，是“天子”。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①把王描绘成沟通天地人的超人，使之从普通人中游离出去而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其次，将君权神圣化。《礼记·表记》称“唯天子受命于天”。董仲舒更认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②，又说：“王者，天之所予也。”^③韩愈以后更视之当然。由君权之神圣性而推衍出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再次，将君权绝对化。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帝王对土地、财富的独占权和对子民的操纵权。至于政治权力，诸如政令、人事、财政、决策、刑赏、军事等大权，更是皇帝的不可转让和剥夺的权力。法律则成为帝王的意志和工具，所谓“口含天宪”，法自君出，君意为法，帝王发布的赦令、策令、诏书、谕旨等就是法律文件。如此种种正如司马迁描绘秦始皇时所说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④王权主义发展到极点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君为师，王权甚至高过认识过程的逻辑，而成为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决者。至此，君权被推上社会的峰巅，政治的兴衰成败因而也全部系于王者。

最后，君主是政治安定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孔子认为君主能“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⑤孟子说：“一正君而国定矣。”^⑥《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古代有“国不可一日无君”、“天无二日，家无二尊，土无二王”之说。唐甄认为：“治天下者唯君，乱天下者唯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⑦不同的论说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2—183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123页。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 《论语·子路》。

⑥ 《孟子·离娄上》。

⑦ 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6页。

都强调君主是治国安邦的决定力量。王权绝对化要求君王贤明，但贤明的君王历史上寥若晨星，因此，千年历史战乱苦难不已。所以，明末清初学人才有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感叹。

数千年里，王权主义构成君主专制制度、官僚制度以及政治法规的理论基石，成了封建政治的基本价值，对政治生活和国民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除晚清少数政治家和思想家批判并否定君主专制主义和专制制度外，历史上多数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过程中，都强调要尊君。韩非等法家人物尊君系人所共知。儒家所谓为政以德，德主刑辅，也是以尊君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孔子三月不见君便惶惶不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康熙这些帝王和董仲舒、韩愈、朱熹这些大儒强调尊君自不待言。老子的无为政治论是君人南面术，墨子尚同以君主专制为实质，王符崇“明君”，仲长统要求加强皇权，司马光要“尊君御臣”，张居正力主“尊主庇民”。即使像黄宗羲、龚自珍那样批评专制流弊的思想家，也只是希望有一个开明的专制，仍然不离尊君原则。

其次，王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被制度化。从汉武帝时起，中央官制有“内朝”（由宫廷侍从官组成）与“外朝”（由宰相及文武百官组成）之分，其发展趋势是内朝不断取代外朝，指挥国家的政治活动。唐朝确立三省制度，使相权进一步分散，而且凡被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也都具有宰相的名义和实权。宋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皇权进一步强化。明洪武十三年更直接废除宰相制。从此，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地道的最高行政首脑。清袭明制，有关国家机关的设置、官吏职务的变动、行政事务的决策与指挥、地方官吏的任免等，均由皇帝“乾纲独断”。此外，君主还不断加强行政监察，监控地方政府，以确保牢牢控制各级官员和地方政府。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和官吏制度的发展乃是王权主义的制度化，其间凝聚着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心血。

再次，传统政治思想尽管千差万别，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精神一以贯之。韩非主张强化君权，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吏原则和方法，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谆谆告诫刘禅要“咨谏善道，察纳雅言”；韩愈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①；张居正提出振纪纲、重

①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4页。

诏令。这一切均以强化君主权威，加强集权统治，维护君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甚至黄宗羲怀着对极权政治极度不满，沉痛写下的《明夷待访录》也是留给明主的建言，期望出现一位明君，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数千年来，不论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政治思想、观点有何分歧，但为君主出谋划策，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政治思想飘荡着王权主义的幽灵。这种情况，到了晚清才逐渐得以改变。

王权主义原则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环节，虽然有效地维护了君主的专制统治，有时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但却妨碍了各级官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造成冗衙冗员、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导致政治理性的沉沦和主观随意性的泛滥，政治腐败和动乱遂如影随形。此外，也造成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位一体，传统政治结构无法合理分化，政治无法跳出治乱相循的怪圈。

此外，借助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渠道，王权思想逐渐内化为人民的政治自觉，造成民族性的君权崇拜、迷信、盲从和畏惧。广大民众将国家、社会、自身的命运寄托在君王身上，对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合理性高度认同，对自身的力量毫无感知，身处逆境不反求诸己，而求诸明君，以致民国后竟然有人向以推翻王权政治为矢志的孙中山打听真龙天子何时再生，真是意味深长。同时，随着专制君权的膨胀和专制政治的发展，造成与人民的权力距离，遂使得人民以国家为帝王私产，以政治为身外之事，对国家政治冷漠处之。这冷漠不仅在于子民，也包括众多的官僚士大夫。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是细究历史，不知亡国恨的又岂止是商女。当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时，广东省城士绅可以不管，日夜演戏；当八国联军入京烧杀抢掠时，上海官绅依然笙歌箫鼓，其乐融融。有的人甚至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自己的政治冷漠进行辩护。

因为王权主义在封建社会大行其道，就使得民权无法伸张和立足。因为上至官吏，下至士农工商深深认同于此，因此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提出民权，遇到的不仅是冷漠，而且是当头棒喝，冷水浇背，诽谤打击。张之洞说得最完整彻底，他认为民权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如一旦“人人有自主之权”，势必